

序 言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张邦英

耀县党史资料征研办公室的同志倾注很大心力编辑的《耀县起义》专集即将出版，这对于启迪后人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艰苦创业精神，建设我们社会主义是有益的。

在《耀县起义》专集出版前，要我写一个序言，经我再三思索，作为当时一名亲身参加者有点义不容辞，只好欣然允诺。

光阴荏苒，具有一定政治和历史意义的耀县起义，至今已五十六年了，起义的壮举仍历历在目。当时，驻扎在陕西耀县的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非常不满；特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侵占了我东北，继续南侵华北，而蒋介石却按兵不动，把大好河山拱手相送，我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使他忧国忧民，抗日心切。与此同时，党中央所领导的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日益发展、壮大；并在我党整理的，并得到了有关单位的热情支持和积极配合。

省党史征委会征研室主任高中哲同志亲切关怀、热情帮助，在资料征集时提供了不少方便，在专辑编写时进行了许多具体指导。省党史征委会编辑室主任贾自新同志在本辑编辑时也进行了许多技术指导。铜川市委党史办公室乔留邦、杨文辉、王都玺等同志审阅了本辑资料，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三、本辑是由中共耀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杨增杰、阴育氏同志主编的。任双全、董秉坤、李守恩同志参加了资料的核实和整理工作。

在编辑过程中，县委书记杨尚坤同志热情支持，审定了稿件，并为本书写了《序》。县委副书记胡克禹、李恩福同志审阅了部分重要资料和综述，并进行了很多具体指导。

四、耀县起义至今已五十余年，收集到的原始文件不多；回忆录中也有些问题说法不尽一致，有待进一步考证核实。加之编者水平有限，遗漏和差错在所难免，恳请了解情况的老同志和党史工作者补充、指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和全国军民同仇敌忾的鼓舞下，激发了他抗日救国救民的勇气和决心，便暗中通过周围进步好友与党取得联系，遂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和耀县党组织的配合下，率全体官兵宣告起义，举起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旗帜。起义中发表了抗日宣言，通电全国；成立了耀县临时革命政权，建立了耀县游击队；收缴了当地的反动团队武装，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释放了政治犯；没收了几家大地主、豪绅的财粮，分给了贫苦群众，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欢迎和拥护。

这次起义由于许多主、客观原因，致使起义虽然很快失败了，但起义的作用和影响则是很大的。它不仅以实际行动进行了抗日宣传，而且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一个打击。同时，对于改变当时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困难形势也是十分有利的。其余部退入照金革命根据地后，在陕甘边特委和省委派人领导下，同其他革命武装一起继续进行战斗，王泰吉同志被任命为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随后改编为红四十二师时担任师长，。与刘志丹等同志一起同心协力，艰苦奋斗，有力的打击消灭敌人；对恢复红二十六军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王泰吉同志是陕西省建党初期的共产党员之一。他一贯勤奋好学，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住过黄埔军校；曾先后参与领导了麟游、渭华起义，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卓越贡献。虽然曾一度 and 党失去了联系，但他始终相信共产党，热爱国家民族，热爱共产主义，是一个有抱负、有志向、要为人民做一番事业的人，在西北人民群众中有很影响。不幸于一九三四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

王泰吉同志的业绩必将永载史册，其历史功勋永垂不朽!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楷模。

一九八九年十月一日

回忆耀县起义

习仲勋②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东北，又向华北进犯，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全国掀起了抗日的高潮。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红色区域、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人民等条件下，和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同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和共产党员吉鸿昌等合作，在张家口成立了察绥抗日同盟军。。早年与王泰吉熟悉的许权中、谢子长等同志，先后奔赴察绥前线，参加了抗日同盟军，守土保国，对王泰吉影响很大。他想奔上抗日前线，为国家、为民族效力。

但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许抗战。1933年初夏，王泰吉的骑兵团由三原县移防到耀县。党曾多次指示杨虎城部队的地下党员秘密进行组织起义的工作。王泰吉也主动派入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等同志联系，表示要发动骑兵团起义，参加抗日斗争。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1933年7月21日，王泰吉率领骑兵团近两千人，在耀县宣布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随即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起义部队迅速解除了全城的反动武装；打开监狱，释放了关押的全部犯人；组织宣传队，张贴抗日标语，召开群众大会；打开伪县政府和城里几家大地主的粮仓，发动贫苦农民进行分粮斗争并开展游击运动；又处决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民团头子和恶霸地主，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耀县起义，意义很大，影响深广。当时，我陕甘边主力部队红二十六军在政委杜衡的“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南下渭华在蓝田失败，

几乎全军覆没。敌人调动大批武装，妄图一举荡平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继之，杜衡又在西安被捕叛变，使陕西党组织遭到严重损失和破坏。在这种革命暂时受挫的形势下，王泰吉毅然决然率骑兵团起义，犹如石破天惊，在奄奄一息的革命火堆上加了一把干柴。它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的嚣张气焰，激励了处于困难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动，鼓舞了西北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对于后来加强壮大西北红军、巩固发展陕甘边苏区都起了重大作用。

泰吉率起义部队在耀县停留几天后，即向三原进发，想把那里驻防的杨竹荪团也拉过来参加起义，但行至辘辘把村时，突遭敌孙友仁团袭击，战斗失利，起义部队大部分溃散了。面对挫折，王泰吉毫不动摇，收集了余部三百余人，向照金革命根据地撤退。

注：

①件摘自陕西《革命英烈》1984年第三期，题目是编者加的。

②习仲勋，陕西富平县人，1933年曾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陕甘边团特委书记。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关于耀县起义和红二十六军的恢复

张邦英①

1933年7月21日，驻扎陕西西安北部耀县的杨虎城部骑兵团近千人，在团长王泰吉的率领和耀县党组织的配合下，举行起义。这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和振奋人心的大事件，对于恢复和发展红二十六军，促进陕甘边地区的革命斗争和根据地的建立，曾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

王泰吉耀县起义不是偶然的。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黄埔军校学习，立志要为人民做一番事业。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参加了麟游起义和渭华暴动，曾一度被国民党关入南京“中央监狱”，出狱后到杨虎城部任副旅长等职，1931年担任了骑兵团团长。一个时期内，他虽然与党失去了联系，但是革命意志没有消蚀，仍寻找时机，待机而动。1933年上半年，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军事思想指导下，粉碎了蒋介石军队的第四次围剿；其他根据地的斗争也取得了许多胜利，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日益发展壮大；在王泰吉骑兵团驻防区内的红二十六军、游击队的活动和渭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等，都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时，正值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后，继续南侵，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把大好河山拱手相送。在我民族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了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自由权利、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中愿意同我合作抗日的部队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冯玉祥、方振武和吉鸿昌(共产党员)将军在日寇攻陷热河、长城各口相继告急的情况下，响应党的号召，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建立抗日同盟军，积极对日作战，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对王泰吉起义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加之，王泰吉对国民党统治和所在部队的现状不满，又受到他周围的谈国帆等革命同志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的思想影响，便决心在党的领导下率部起义，打开西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局面。经过他的老朋友共产党员何寓础及李树言、余海丰同志的帮助，王泰吉于33年6月间，与中共陕西省委建立了联系，并对起义作了秘密部署。当时在王部当班长的泰吉的侄儿、共产党员王振民(以后改名为王买)，在起义前后也从中进行了疏通与党的联系和联络一部分士兵的活动。起义经过两个来月的准备，终于在7月21日，以号音为令，宣告举行。

对于这次起义，省委很重视，除派杨声为代表到王泰吉部进行具体指导和派龚逢春等同志帮助工作外，省委代表杜衡(以后叛变)曾于

起义前和起义当天两次来到耀县，并召开县委会议，对如何配合王部起义作了传达、布置。起义开始后，王泰吉部队迅速收缴了。共城内雷天一民团和胡景铨保安团的武装，释放了许多在押犯人，树起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旗帜，并张贴布告，通电全国。同时，他们在耀县党组织配合下，成立了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没收、分配了伪县政府、奸商屯积的粮食和全县有名的雷、段两家大地主的财物；进行了肃清反动分子的工作，逮捕了高干臣等一部分反动豪绅、地主，没收、分配了他们的许多财产；在县政府西边大操场上召开群众大会，当众枪毙了镇压农民革命斗争的伪南区区长张恒义，人心为之大快。在这次起义中，耀县县委在上级指导下，始终把建立革命武装，配合王泰吉起义，作为重要任务。起义的当天，张仲良同志也从西安派回。我们一起在县委会上进行了分工，一面发动党员、农民群众组织游击队；一面利用社会关系，将北区赵连璧民团的 40 多人争取：过来，并作了必要的整顿，打死反动团副朱瑞轩。另外，又从王泰吉那里搞来 19 支毛瑟枪，从雷天一的军需手里弄来一部分库存的枪支和几箱子子弹，组成一支约有 100 人。60 多支枪的革命武装——耀县游击队。这支武装一成立，即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斗争，处死了全县有名的阿姑社恶霸地主左善楚兄弟三人，没收、分配了他家的财物，烧毁了全部土地、债务契约；活捉并处死了在孙家原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的兵痞流氓张廉明；还分了白家庄财主周老四的粮食给贫苦农民，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起义几天后，为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其他国民党军队响应，王泰吉部队主动撤离耀县，向三原方向行动。在途经三原心、武革命根据地时，受到当地党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慰问，使起义官兵很受鼓舞。但是，这支部队在起义中，存在许多缺点、错误。部队中党的力量过于薄弱，全团仅有党员一、二人，起义时虽派去几位同志，但一时发挥不了核心骨干作用。起义的准备时间较短，政治思想工作很差，许多官兵对抗日义举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胜利信心。部队军纪松弛，兵心涣散，有相当多的官兵借起义之机发了洋财，不愿打仗。领导用人不当，轻信坏人，起义前未对本部不可靠人员作适当处理；起义中将耀

县正在卸职的伪县长，委任为起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开始收缴了雷天一民团的枪，可是当他装着也要参加抗日，并说我过去在他部队时就向他谈过打红旗的问题，现在已到了一起打红旗的时候了，便信以为真，不仅将收缴的枪支全部退回，还任命他为支队队长，派去打王茂臣反动民团，然而他一开出城就驻扎西原稠桑，按兵不动，暗中与西安当局勾结，起了瓦解起义部队的作用，指挥上对敌估计不足，采取了向敌人统治中心三原一带行动的错误方针，加之对前来进剿之敌也没搞清，当部队进抵桥头镇辘辘把时，被杨虎城部孙苍狼②特务团一打即溃，退到耀县小丘后，又遭敌进击，整个部队或歼、或降、或逃，进入照金革命根据地时，只剩下一百多人。

在王泰吉义勇军退到照金根据地的前一、二天，陈学鼎、张仲良(任耀县游击队正副队长)和我(任耀县游击队党代表、政治指导员)所带的耀县游击队，经过若干天的斗争，先进入照金根据地，并在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指挥下，于高山槐打退了前来进攻的雷天一民团，毙伤其一部；接着，与义勇军一起，打了照金后沟寨子，消灭了李彦宁民团，收缴了全部枪支；次日，又联合义勇军同前来进剿的孙苍狼军队打了一仗。经过这一仗，义勇军又受到一些损失，连同遣散走的人员，尚余不足百人。不多天，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在敌人围剿下，由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带领，从心、武区也到达照金根据地。三支部队与当地革命武装汇合一起，共有四百多人、三百多支枪，使照金革命根据地在红二十六军二团，离开后(原照金地区的红二十六军二团，在杜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指挥下，于1933年5月，去渭华地区建立根据地，在终南山失败)的困难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王泰吉起义总的看是失败了，部队受到严重损失，所剩不多，但是起义本身却是一次重大的革命行动，对扩大抗日影响，发展革命武装，增加红军力量，改变红二十六军二团失败后的局面，鼓舞根据地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都起了很大作用，同时，对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反动统治，也是一个打击。以后，这支部队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革命战争锻炼，指战员的政治觉悟逐渐提高，部队不断吸收新的成份，

成为红二十六军恢复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上述几支部队汇集照金根据地后，由于当地山高林深、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大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是吃饭问题。当时我们耀县游击从改称为陕甘边游击队第三支队，分别住在薛家寨下边黑田峪的岩洞和附近山村，吃的多是群众只磨不筛的麸子面饼和包谷渣粥等，加之住处潮湿，许多人饭后胃里发烧、拉肚子，有些战士说怪话。虽然部队在当地党政和游击队的帮助下，从周围其他地方搞来一些粮食，及时解决了这一困难，但当时遇到的更重要问题，还是对这支部队怎样领导，以后如何行动，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方针。对此，陕甘边特委和部队的领导同志，于八月十四日，在照金附近的陈家坡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从省委前来担任义勇军政委的高岗和特委书记秦武山，团特委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政委张秀山，以及红四团的杨森、黄予祥、王伯栋，耀县三支队的我和陈学鼎等同志。这次会上曾发生了很大争论，焦点是集中统一行动，还是分散行动的问题。集中行动，可以使部队形成一令拳头和一支坚强的力量，提高士气，相机打击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分散行动，就会削弱部队的战斗力，特别是在当时情况下，有被敌人各个击破、消灭的危险。以黄子祥为代表的极少数同志认为，一起行动，目标太大，困难很多，行动不便，主张各回各地，把他们的部队带回渭北地区去。这种意见遭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反对。经过一个下午又一晚上的讨论，会议最终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将红四团、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组成主力部队，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解决了部队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问题。

总指挥部成立后，先于 8 月 27 日在让牛村消灭了雷天一民团一

部，随后又打了庙湾和柳林镇等地，消灭了夏玉山的部分民团。经过几次战斗，使周围敌人不敢对我照金根据地轻举妄动，同时也锻炼了我们的部队，提高了作战胜利的信心。接着，部队向西行动，并在七介石附近，与强世清所带的陕北安定游击队汇合。9月25日中午，当部队进至底庙时，旬邑县城所在地张洪镇的民团，仓促出动60多人前来打我们，被我骑步兵合击，迅速歼灭。随即，部队乘势智取张洪镇。当时挑选了十多名机警战士，换上民团服装，暗携短枪，并从被俘人员中找了一个曾对红军有认识、交过枪的班长宋飞(以后参加了红军、作了领导干部)，一起装成民团，沿大路向张洪镇进发，大部队利用秋庄稼作隐蔽，随后紧跟，说好到城下时，由宋飞答话，以其团队被红军缴械放回为由，在敌一时分辨不清的情况下，开城而进。整个部队经过30多里的急行军，并越过一条深沟，于当天下午四、五点钟到达城下。敌人见后，果然上当，部队迅速缴了城门卫兵和城内一部分敌人的枪。此时，民团团总和他的小老婆还在炕上抽大烟，直到见我们的人冲进他们的房间，才恍然大悟，连忙摘下挂在墙上的手枪，一起同冲进来的我军班长芮四扭打起来，被跟进来的王安民同志当场击毙。部队随即控制了全城。这次战斗共缴枪八、九十支，并释放了全部在押犯人，没收了伪县政府和土豪劣绅的许多布匹、粮食和钱财，镇压了伪县党书记和几个群众最愤恨的反动豪绅，取得了一次大的胜利。次日，部队冒雨返回照金。

部队回到照金时，适逢阴历八月十五，正好这天刘志丹和王世泰、曹士荣、黄子祥等同志也于红二团终南山失败后返回。大家相见，十分高兴，一起过了一个胜利而又欢快的中秋节。志丹同志回来后，遂被任命为红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同他一起南下的杨琪、吴岱峰、高锦纯、牛刚、黄罗斌，刘约山、魏武、王兆祥、康健民、王有福、芮四、赵清法、苏世杰(小名七仔)等二十多位同志，先前已陆续回来，多数又到部队工作，使部队的领导和骨干力量得到了加强。一、二天后，部队经宜君西部向甘肃行动，于10月18日奔袭了合水县城事前，部队曾在合水城东四十里的黑木原停留了一天，准备云梯等登城工具，同时封锁消息，侦察地形、敌情。18日晚，趁天黑人静，部队悄悄

地向合水县城急进，鸡叫前到达城下。三支突击队，从城东面的南北两角登城。北面的突击队首先登上城头，接着南面的突击队也占领了南城头，随即，主攻连紧跟上去，迅速攻占东城楼，歼灭了许多敌人，打开城门，使大部队顺利进城，继续扩大战果。这次战斗除少数敌军和一些伪政府官员，从西城门仓惶逃跑外，共消灭赵文智部下一个连和部分民团，缴枪百余支。战斗结束后，天色已明。我军一面释放在押犯人，营救革命同志，一面向市民进行宣传，扩大红军的影响。同时，没收了伪政府和杜老爷等几家豪绅、地主的许多财物、大洋，逮走了伪税务局长和十几个钱多势大之土豪。部队于当天日暮时撤出，向宁县塔儿原转移。

在我主力部队北上攻打合水之前，由于我军连续打了不少胜仗，尤其是打下旬邑县城张洪镇，对陕西的国民党统治势力震动很大。蒋介石曾电令邵力子、杨虎城迅速肃清照金薛家寨“残匪”。于是，杨虎城趁我主力部队攻打合水之机，调集孙苍狼特务团和耀县、宜君、淳化等几县民团两、三千人，围剿我照金根据地。在敌人连续五、六天进攻、炮轰的情况下，我党政领导机关和张秀山、吴岱峰(当时担任游击队指挥)所带的防守部队，先后撤离薛家寨，向合水、庆阳方向转移，留下当地游击队在附近淳、旬边界继续坚持斗争。接着，甘肃伪政府调杨子恒部配合陕西驻洛川的冯钦哉部和驻延安的井岳秀部，又对我主力部队进行追剿。这时，我军已打完合水，在由宁县向庆阳一带行动中，分别消灭了三十里铺、城壕川的民团。10月29日，部队在毛家沟门，对尾追我军的甘肃警一旅赵文治团进行了反击。当天，该团约千人，从三面向我扑来。敌人步步紧逼，我军且战且退，待退到村后的山上时，又发现庆阳五属谭世麟民团近百名骑兵，已集结在我后侧的北梁上，相机而动。。在此危急关头，我军在王泰吉、刘志丹的指挥下，立即命令一个连强占有利地形，顶住正面敌人，同时组织附近其它部队猛烈反击，奋力冲杀，迫敌退却，并乘胜追歼了许多敌人。此时，谭世麟的骑兵见势不妙，不战而逃。。这一仗，大挫了敌人的锐气，打退了敌人的追剿。

(三)

随着我主力部队的发展，为进一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壮大革命力量，总指挥部和陕甘边特委领导同志，于1933年11月13日，在合水包家寨召开重要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部队改编和根据地建设问题，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由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将西北抗日义勇军大队、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少年先锋队改编为红三团(耀县战士在全团占一半，有“耀半团”、“老三团”之称)的一、二连和先锋连，由王世泰任团长、李映南任政委(以后叛变)；原红四团改为骑兵团，仍由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改编后，四十二师共辖两个团约400人、60多匹战马。会议在志丹同志提议下，还总结了原红二团终南山失败和渭北心、武区根据地、照金根据地失守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进行武装斗争，只有一个根据地不行，必须建立几个根据地，才能使我军有较大回旋余地，依靠群众，战胜敌人，即所谓“狡兔三窟”。为此，会议决定以南梁地区为中心，建立三个根据地，成立三路游击队指挥部，即以陕北安定为中心建立一路游击队，强世清为指挥、魏武为政委；以陇东南梁为中心建立二路游击队，杨琪为指挥、后由高岗为政委；以关中照金为中心建立三路游击队，王安民为指挥、张仲良为政委。在此基础上，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主力部队根据敌情变化，居中策应，配合当地游击队主动打击、消灭敌人。

恢复红二十六军和建立三路游击队的决定，对全体指战员是个很大的鼓舞。会议结束后，部队在东华池莲花寺进行了改编，并召开了军人大会，欢送跟随主力部队战斗三个月、已全部武装起来的陕北安定游击队，返回安定，建立根据地，杨森同志在会上讲了话，魏武同志表示了决心。随后，部队又相继派张策、刘约三、强嘉珍、阴云山、

郭炳坤、李尚勤等同志，去二、三路地区做建立根据地和发展地方武装的工作。

接着，我四十二师主力挥戈南下，帮助三路游击队恢复和发展照金区域。10月20日，我军进至宜君杨家店子时，敌二三六旅五一团的一个连，误以为是游击队，趁次日晨大雾弥漫之际，前来袭击。当时我军有些疏忽，直至敌人进入街里才被发现，于是奋起迎击，且战且调动部队，迫敌退到山上与我对峙。午后，我军从正面及两侧向敌人发起攻击，并以一部分部队迂回到敌后包围。经过激烈战斗，将敌连长李文杰以下一百余人，全部歼灭。由于我军在这次战斗中伤亡很大，伤员不好安置，部队遂改变原定计划，经小石崖、尚畛子返回合水东华池一带。

部队在合水东华池地区稍加休整后，遂分兵两路，打击消灭当地及附近敌人。师部随三团向东行动，消灭了甘泉道佐铺的民团数十人；袭击甘泉县城之敌未能成功；在向洛河川的葡萄沟口行动中，反击了尾随并企图包围我军的敌二五六旅的一个营，消灭了一些敌人。骑兵团向西北行动，歼灭了新堡、梨园堡、阎家洼子、赵家沟门的民团和陕西警备骑兵团二团张廷芝新兵连一部，为建立南梁根据地，使陕甘边党政领导机关安于此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不久，红三团和骑兵团在二将川汇合，并再次南下，向正宁、旬邑、淳化一带行动。十二月中旬，部队占领了正宁南邑的后沟寨子，收缴了部分守寨民团的枪支后，又返回东华池一带。在行动中，听说山东“人民军”刘桂堂部，开到豫陕边境。为争取其一部分武装参加革命，王泰吉同志要求前去活动，用他的话说，就是“出去放一把火”。经师党委在莲家砭会议上研究同意，泰吉随部队于1934年1月中旬经耀县、铜川开到淳化强家山的一天夜里，同一个警卫员携带两支双背吉手枪、两匹骡子和一些旅费，由少数骑兵护送到通润镇他过去的部下马云从处(当时马任伪淳化县三区民团团长)，想先取得他对这一活动的支持，不料被马出卖。不多天，泰吉被解到西安绥署军法处。在敌严刑之下，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并赋诗抒怀，于1934年3

月3日，在西安从容就义，时年仅28岁。每念及此，令人十分痛惜。

王泰吉走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即由刘志丹担任，杨森接任师政委(原政委高岗不久前因违纪调离，任二路游击队政委)。从此，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便在刘志丹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前赴后继，英勇战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

注：

①邦英：陕西省耀县人。耀县起义时任中共耀县县委书记，曾任红二十六军三团二连指导员、中共陕甘边南区党委书记等职。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等职，现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②即孙辅丞，字友仁，外号孙苍狼。

回忆西北红军领导人之一

王泰吉烈士①

张秀山②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后，全国的抗日形势有了新的发展。陕西杨虎城十七路军对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苏区的围剿也停顿了一个时期。我们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利用时机除了打击反动的顽固敌人，保卫红色政权外，主要在正宁、宁县、淳化、耀县、旬邑一带开展群众运动。发动穷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宣传革命思想和我党的抗日主张。这时红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同志向组织提出：利用出现的合作抗日新形势，自己到豫陕边界，陕西商洛一带开展兵运工作。王泰吉同志曾在这些地区的军阀部队中活动过，有一定基础，有的人过去和他关系还比较密切。他认为，为了扩大我党抗日救国政治主张的影响和壮大红

军的军事力量，可以凭借这些老关系，在白区开展工作，争取到一些人站到合作抗日一方来。这对革命事业是有利的。师党委经过研究，批准了泰吉同志的要求。

淳化县通润镇民团团总马云从以前是泰吉的老部下，我们看错了他，以为他不至于太坏。部队南下到淳化县强家山时与马云从进行了联系，泰吉同志准备从他那儿路过，去豫陕边界。那天晚上，马云从派了两个人来接，泰吉同志换上便衣，带了手枪，骑着骡子出发。可是，一到通润镇，马云从翻了脸，把泰吉抓了起来，并立即向西安国民党报功，说抓到共产党重要分子。西安派了一个营到淳化把王泰吉同志押走。不久王泰吉同志便在西安英勇就义，年仅 28 岁。

泰吉同志的牺牲，使我们非常悲痛，真不该同意他到白区去搞兵运工作的要求，更不该轻信马云从这类敌人，以至铸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至今想起仍感内疚。

泰吉的牺牲对西北红军是个严重的损失。他对创造西北红军和陕甘苏区做出过卓越的贡献。

1933 年春，国民党部署“围剿”我陕甘边苏区，动员了十个团的兵力，妄图一举消灭我们红二十六军和攻占照金根据地。陕西省委给二十六军发出了“粉碎敌人十团兵力围剿”的指示信。这时，王泰吉同志还在十七路军中担任骑兵团团长，杨虎城任命他为“剿匪”总指挥。泰吉率该骑兵团(实际没有马)为追击部队，其余九个团布置在陕西、甘肃一带担任堵击任务。泰吉带着部队跟在红军屁股后面相隔不远，虚张声势。有一次在淳化，我们红军驻在小茨，十七路军骑兵团驻在铁王，两家的哨兵互相看得见，也不开火。泰吉起义后在照金地区时，我曾问过他，离得那么近为什么不开火？泰吉幽默地说：“那是客气嘛！”红军北上了，泰吉又率部向北跟进了两天就返回照金，经薛家寨山下的秀房沟口到柳林镇，又回防到耀县，开始准备他们的起义计划。由于王泰吉跟在红军后面不打，也没有给那些堵击的部队下达命令，国民党的这次“围剿”，就应付过去了。泰吉参加红军后，

有一次他对我说，他回到西安向杨虎城交差时说：“这次把刘志丹的部队打败了，都跑到山里找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一个薛家寨(我们的后方基地)，地形险要，工事坚固，没有炮兵打不下来。”杨虎城说：“算了吧，打人家的寨子干啥。”杨虎城说这话，也表明此时他和蒋介石、胡宗南的矛盾突出，对“剿共”战争消极。就这样，国民党纠集的声势浩大的十个团“围剿”红军，在泰吉同志的巧妙安排下，使红军不战自胜。如果当时是由国民党孙友仁那样的人来担任指挥，那么，力量相对弱小的红军要经过十分残酷的斗争，付出相当大的牺牲才能战胜凶恶的敌人。还是由于王泰吉同志在敌人内部的出色工作，才使十倍于我的敌军退回原防地，红军才得以在关中及陇东方向积极活动，取得很多胜利。每当想起这段往事，总是十分怀念泰吉同志这段不平凡的工作。

1933年7月，王泰吉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率领骑兵团在陕西耀县举行了震撼西北的武装起义，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泰吉任总司令，省委派杨声(刘映胜)任政治部主任。义勇军到三原县的武字区和红四团会合，召开了群众大会，渭北苏区的老百姓非常高兴，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但是敌人对他们非常仇恨，当义勇军向西进发途中，在辘辘把和十七路军孙友仁(外号孙苍狼)团遭遇，后退到照金。李妙斋同志是耀西游击队总指挥，我也在游击队里工作，我们在照金迎接了王泰吉的义勇军，把他们安顿在耀西游击队驻地薛家寨山下的秀房沟村庄里住，并且开了欢迎会，义勇军正式参加到红军的序列。起义军带来了许多辎重，其中有一百挺没有装起来的机关枪和迫击炮、在当时这是数量相当大的武器装备。根据省委指示精神，陕甘边特委在薛家寨开会决定：刚由省委介绍来的高岗为义勇军政委，王泰吉仍为总司令。第二天，泰吉率领义勇军在薛家寨上集合起来，宣布了特委的决定。同志们看见身穿军装、精神饱满的义勇军战士整齐的队列，都为红军增加了生力军而高兴。

注：

①此材料系 1983 年张秀山同志为纪念王泰吉烈士逝世五十周年所写的文章，本文刊登时有删节。

②张秀山，陕西省神木县人，耀县起义时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委员、陕甘边游击队指挥部政委。现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来源：《耀县起义》

王泰吉骑兵团的起义①

赵伯平②

1933 年春初，王泰吉奉命离开西安，开到三原。王部共有四个大连，团部有 3 个党员和一些受我党影响的人士。这三个党员，一个是王振民(又名王英)，一个姓聂的(此人以后变坏)和一个河南籍的卫生员(姓名已忘记)。二月初该骑兵团团部驻在三原，中心县委通过王振民了解王泰吉的动态并作他的工作。同年四、五月间，王部奉命调往耀县，进攻我照金根据地。王泰吉不愿执行这一命令，找到三原中心县委的常委周芝轩，向周说，他决心起义当红军。并说他在西安时曾请何寓础找过陕西省委。找中心县委的目的是：1、汇报起义计划，争取党的领导；2、请中心县委通知渭北游击队，不要进攻他的部队。我当时问周芝轩：“王的态度怎样？决心如何？”周说：“王泰吉的态度诚恳，为表示他的决心，还送给我一支驳壳枪。”我与周商定第二天清晨约见王泰吉。但不巧，第二天拂晓，王已动身到耀县去了，他的起义计划要周向我汇报。不几天，省委派杜衡、何寓础来三原，中心县委也派周芝轩、孙烈和他们一起去耀县，在政治上、军事上帮助王泰吉起义。不久，王泰吉部在耀县举行了起义，成立了西北抗日义勇军。

王泰吉起义后，派入和中心县委联系，要来三原武字区，说他们

在三原驻防时，杨竹荪的一个营曾和他们约好一齐起义，因此要到三原来接应这一营部队，但是起义部队来三原的人员不多，杨部的这一个营也未能出城跟随起义。

起义部队在耀县小丘镇③曾召开过一次军民联欢大会，起义部队党代表杨声④在大会上讲话，我以武字区群众代表身份参加了这一大会。大会气氛热烈，人心振奋。会后，我向杨声要求，给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一些枪支弹药，杨和王均表同意，立即给了十支单串枪，还给了省委一些财物做活动经费，杜衡当时给了三原中心县委一些，其余委托红四团负责卖掉，将钱带回西安。

王部的起义，使杨虎城感到震动。他任命刘文伯为渭北“剿匪”总司令，司令部设在三原县城的第三中学，并派其嫡系赵玉亭、孙友仁向王泰吉进攻。起义部队与进攻敌军在耀县辘辘把⑤与孙友仁部打了一个遭遇战，红四团积极配合战斗，在孙友仁部的东侧，牵制孙部使其不能倾全力向起义部队进攻。这一仗王部虽有损伤，但基本力量保持下来，可是当起义部队返回耀县时，原来随同起义的民团团总雷天一突然变卦，将耀县城门统统关闭，起义部队无奈，绕道城西，反复转战，进入照金根据地。后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三团，保存了一部分革命力量。

注：

①摘自赵伯平《三原中心县委 1933 年斗争情况的回忆》。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赵伯平现任全国政协常委。

③三原武字区陵前一带。

④即刘映胜。

⑤辘辘把属三原县辖。

来源：《耀县起义》

耀县起义经过①

谈国帆②

我是 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杨虎城进关第二年我在杨的骑兵团任二连连长，团长是王泰吉。就我了解，王泰吉在麟游就搞过兵变，还参加过渭华暴动，在渭华暴动时他是党员，以后失掉了关系，耀县起义时不是党员，但思想很进步，和党内联系密切。骑兵团里还有不少共产党员，现在能记得起的有刘清合、赵启民、魏志坚、袁宏化、陈守印、王买。起义时王英还在骑兵团，其他党员有的牺牲了，有的已先后离开了部队。

骑兵团 1931、1932 年驻防西安，王泰吉任城防司令，二连守西门。当时刘志丹同志在陕北等地领导开展游击战，但装备非常困难。党给我们的任务：一个是武装护送弹药和其它军用品(这些物资一部分是由骑兵团送给的，一部分是地下组织购买的)；一个是接送党内来往行人。约在 1932 年后季部队开往户县，后又由三原开往耀县，时王泰吉任渭北“剿匪”总司令。主要是针对我党、武区，但在这方面王并不积极，而且继续给我们很大帮助。

1933 年五、六月间，王泰吉就准备起义。王和省委有联系，也得到了三原县委的支持，党领导了这次兵暴。

记得起义前一天晚上，王泰吉召集连以上干部和积极分子在耀县教育局开会，杜衡代表省委在会上讲了话，对起义作了详细计划。第二天用电台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起义，收编了雷天一地方民团，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总指挥兼第三路指挥，政治部主任是杨声，骑兵团和民团共一手几百人。编了五个大队，第一大队郑

子明任队长，第二大队任建民任队长，第三大队张龙韬(山西人，王泰吉的学生)任队长，第四大队周德民任队长，特务大队由我担任队长，每个大队都有民团的一个中队。起义后在耀县停了七天，曾发动群众打土豪，搜捕豪绅，分粮给贫苦市民，搞了一百多驮子物资。起义后还搞了很多枪和药品，很大一部分供给了耀县地下党张仲良、陈国标等领导的游击队。

起义后原计划到三原搞掉杨竹荪团，因事前曾和该团武营长③有联系，准备里应外合，然后到武字区和渭北游击队会合。但因天雨，起义部队没有到三原，由耀县开到陵前侯家堡，召开了群众大会，准备过倬玉河到心字区。部队到鲁桥发现有敌人，又开到辘辘把和孙苍狼④部队遭遇，后部队分散，计划在小丘会合。我所带的特务大队被敌包围在安社，没有赶上集中。据说他们在小丘集中后又决定分散活动，但分散开来以后再没集中起来，王泰吉只带几个人到了照金。我在王到照金的第二天带了九十多人赶到照金。到照金的人留下不多，总共有一百多人。政治部主任由高岗担任。

注:

①根据谈国帆 1959 年 7 月窃问谈话纪录整理。已经本人作了校订。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谈国帆原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已逝世。

③即武靖尘。

④即孙辅丞，字友仁。

来源：《耀县起义》

回忆王泰吉在耀县起义情况①

赵启民②

渭华起义失败后，王泰吉一度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虽经杨虎城将军保释，却失掉了党的组织联系。1931年，王泰吉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骑兵团长兼西安城防司令，虽然这时他尚未同党组织接上联系，但他对革命的事业从未失去信心。骑兵团有四个大连(相当营)，有两个连长是共产党员(一连长魏志坚，二连长刘清和)，还有些班、排长也是共产党员，连里有秘密中共党支部，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在骑兵团以副官或服务员(编外人员)的名义作掩护，做党的工作，如袁宏化等。我也一度以服务员的(后任排长)的名义，做党的交通工作。还利用职务之便，开一些西安城防司令部的证件给党组织，保护地下党活动的安全。王泰吉对这些情况是知道的，但从不阻拦。某件事过于暴露了，他只是一般地提醒我“引起注意”。有一次，他把我叫去问：“城防司令部的证件怎么发的那么多？你要注意把关防管严一点。”就此了事。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狰狞面目更加暴露，国家民族的存亡，处于紧要关头。爱国之士无不义愤填膺。而当时统治中国的蒋介石，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

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在停止进攻红色区域、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人

民三个条件下和国民党中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部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这时，日军已攻占热河，华北告急。同年五月，冯玉祥、吉鸿昌(共产党员)、方振武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在张家口组织起“察绥抗日同盟军”，举起抗日大旗。同盟军在日、蒋夹击下，处境困难，于九月底遭受失败。

王泰吉的骑兵团于这年夏初移驻耀县，奉命进攻红色根据地。王泰吉出于爱国热情和不甘心做国民党的鹰犬，对进攻红军的命令消极

应付，而积极寻找党的关系。在和中共陕西省委取得联系后，他接受党的领导，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在耀县率全团起义，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泰吉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恢复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起义后，在同围剿敌军的战斗中两次失利，起义部队损失严重，随后转入照金革命根据地，同耀县游击队、红四团等几支武装建立统一的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后改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刘志丹任参谋长。

耀县起义鼓舞了西北爱国军民的抗日热情，对国民党和蒋介石反动统治震动很大，为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壮大红军力量起了重大作用。

注：

①此件摘自陕西《革命英烈》1984 年第三期，赵启民《怀念革命烈士王泰吉》，题目是编者加的。

②赵启民，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政委，现离休。

来源：《耀县起义》

耀县起义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建立经过①

王 英②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和领导下，抗

日救亡的风暴不断高涨。

1933年7月，驻守在耀县的西安绥靖公署所属的骑兵团，在面临着起义抗日，还是作鹰犬继续与红军为敌的历史抉择面前，毅然高举爱国起义的大旗，坚定地站在革命人民的一边，为西北人民的革命斗争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骑兵团的团长是王泰吉。这个团成立于1931年，开始叫“新兵训练处”。西安绥靖公署把甘军苏雨生骑兵团的几百匹马拨来以后，才改名为骑兵团。1932年春，杨虎城派宪兵把骑兵团的大部分马匹送给了南京伪中央政府。骑兵团除设军需、军医、副官、书记四处外，下辖四大连和一个直属通讯排，共约千余人。这支部队成份复杂，地域观念浓厚，进步与落后的矛盾相当突出。

骑兵团中的相当一部分革命力量，深感民族危难，力图摆脱现状，为抗日救亡作出贡献，曾先后发动过两次起义。第一次是在1932年冬季，第一连连长魏志坚(党员)在商南领导金连起义，被本连反动班长蒲章成乘魏不备枪杀，部队瓦解(蒲在解放后被逮捕判刑)。第二次是第二连连长刘清和准备起义，想把全连带往嵯峨山和红军游击队苗家祥汇合，不幸泄密失败。

当时在骑兵团进行地下工作的党员袁宏化(团部副官)、赵启民(排长)，因被国民党发觉而离开部队，我和聂××(护士)、秦重民、陈守印留在部队秘密进行军运工作。起义前，聂、陈、秦三人亦先后离开队伍。

当骑兵团移防三原后，我接受赵伯平(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习仲勋(三原中心团县委书记)等同志的指示，积极组织四排起义。当准备工作已取得一定效果，起义即将爆发的时候，三原中心县委鉴于甘肃“两当起义”一个营全部失败的教训，认为组织一个排的起义作用不大而作罢。

1932年5月，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成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日的军事形势为之一振。这时骑兵团已移驻耀县。

王泰吉得悉以上情况并听说同他熟识的杨晓初、张性初、师守命(以上均是党员)、杨可均(拥护我党抗日)等都去了张家口时，不禁热血沸腾，急于有所举动。

为了取得党的领导，王泰吉请他的老同学何寓础为代表去找陕西省委。何找到了党员李树言，由李转告了省委。省委派余海丰同何寓础联系。

何寓础和余海丰于六月中旬到耀县。王泰吉邀请何、余在团部参加了一次骑兵团的军官会议，并都在会上讲了话。会后，何、余两人返回西安。

骑兵团的起义确定之后，王泰吉就秘密召集比较进步的三、四个青年人，和他们谈论抗日救国的道理，并征求他们的意见。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便两次去见王泰吉，谈了一些东北抗日义勇军作战如何英勇，关内应该如何支援，以及本团青年都愿抗日救国等。还借故闯进王的密室，看到了预制的义勇军红旗等，才相信王泰吉确在准备起义。于是我第三次去见王泰吉，见面后即开门见山地说自己就是共产党员。王泰吉听了以后，非常高兴，笑着说：“我真没想到你会是共产党员!你隐蔽得真好，我都没有看出来，咱家又有人干革命了，既然你是共产党员，我就先把计划给你简单的说一下(泰吉和我是叔侄关系)。”接着他又说：“我不问你咱团有多少党员，只要他们愿意抗日，不论老少都行，青年人当然要更多联络些，抗日就是要靠这些青年人嘛!”我便广泛联系进步青年，继续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还了解监视反动军官动态。王泰吉命令加紧在密室制作起义用的旗帜和印信、宣传品等；派出侦察人员分两路去蒲城、白水、韩城、宜君、洛川等县侦察地形和敌情；又派入在耀县附近调查土豪劣绅的住址和恶迹。

起义前夕，省委派杨声来到耀县，会见了王泰吉，确定了起义的一切事宜。王泰吉召开了有连排长和进步青年参加的两次机秘会议，布置了收缴胡景铨民团等敌伪武装的问题；并划分了地区，规定起义时间为中午十二时，只等吃饭号一吹，便统一行动。

1933年7月21日中午十二时，王泰吉率领全团官兵在耀城宣告起义了。

部队起义后立即收缴了全城所有反动武装的枪支(胡景铨民团、雷天一保安团和公安局、县政府)，并收编了他们的部队。骑兵团正式改称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并将起义情况通电全国，争取各地响应。王泰吉自任总司令兼第三路总指挥。

义勇军司令部下令各级报告收缴武器数字。给耀县游击队补充长枪十九支。王泰吉召集全体官兵讲话，教育他们要忠实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并揭露蒋介石集团投降卖国的罪恶勾当。

义勇军成立了政治部，赵宝珊、龚逢春、欧天东、秦重民作政治工作，还吸收了几个文化界人士。杨声派我组成宣传队，把伪县政府及豪绅们千余担粮食、财物分给了贫苦人民。召开了群众大会，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释放了监狱的全部犯人。

七天以后，王泰吉率义勇军从耀县向三原进发。这时部队不到两千入，骡马数百匹，电台一部，迫击炮两门。途经坡子堡时，王茂臣团匪城上向我部射击，我军阵亡战士一名。王泰吉令第一大队包围该堡，部队继续前进。下午遇暴雨，部队行军困难，当晚便驻在三原武字区陵前一带，受到苏区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第二天，在陵前镇召开了联欢会，到会群众约两千多人，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心字区委书记韩学礼同志参加会议，他们给部队送来鸡蛋、瓜果等慰劳品。会上，王泰吉、杨声和群众代表都讲了话，大大鼓舞了抗日部队的革命士气。

第三天，部队向三原县城进发。约在上午十一时，军行三原县桥头镇辘辘把村，与杨虎城部孙友仁特务团遭遇，发生激战。当时王泰吉和杨声被敌军两个连从右翼包围，幸得特务大队奋勇阻击，指挥机关及大行李才得突围而出。王泰吉下令部队向耀县小丘镇撤退，第一大队作后卫掩护全军。当时士兵疲劳，情绪不高，且战且走。伪县长偷逃，第三大队队长张龙韬率部投降胡景铨民团。团部率百余人行至

淳化西原，被杨部赵玉亭一个团阻击，损失大部。第四大队长周德民率部和敌军作战，大部覆没。黄昏时到达小丘镇。半小时后，敌人追至，第一大队四区队阻击片刻，力不能敌，遂向照金方向转移，和习仲勋、李妙斋领导的游击队汇合。义勇军先后到达照金的有：谈国帆所率的特务大队近百人，王泰吉所率的团部机关和后勤人员约六、七十人，赵国卿所率的第一大队一部，第四大队的一部，共约三百人。但有两个情况：到照金后王泰吉曾对士兵说：弟兄们跟着我到了这里，愿意干革命的留下，不愿意干的也不强迫，但走时把枪留下，我发给你们路费，这样有一部分就回了家。另外也有开小差的。第二个情况是部队又经过张阁老崖寨子、柳林等战斗，又有伤亡。特务大队的骑兵排长带了二、三十人又逃跑到西安，投降了杨虎城。最后剩下就是一百多人。

王泰吉领导的耀县起义是在陕甘革命处于低潮、红二十六军主力在蓝田县张家坪失败之际发动的，这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更重要的是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

在王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总指挥期间，又曾率部取得智取胀洪，攻克合水，在毛家沟门击溃敌军一个团等重大胜利。这支起义部队不仅是重建红二十六军主力的重要力量，而且对创建扩大陕甘苏区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耀县起义的经验教训是：

1、王泰吉起义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但部队内部的党组织力量太弱。事实证明，起义部队如果没有坚强的党的基层力量，没有广大人民的支持和当地的革命武装协助，是很难取得完全胜利的。

2、改变军事行动计划是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王泰吉认为三原驻军杨竹荪团有一个营也能起义，遂改变北上白水、澄城为南下三原。这在行动方针上犯了错误。因为敌在南面驻有重兵，且地势平坦对我军作战不利，辘辘把之失败，就是明证。

3、在用人上不重视政治品质，如对雷天一民团，先收缴其武器，后又全部发还；且发给安家费二百元。雷借口出城扩大队伍，不听调遣。当义勇军撤出耀县后，雷即进城管押残杀分粮的贫苦人民，并枪杀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秦重民，公开叛变。

4、军事指挥上，辘辘把遭遇战的失败，主要是思想麻痹，缺乏侦察，情况不明；战术上又分散使用兵力，没有迅速下定决心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集中力量打击敌人，而只派小部兵力掩护撤退，以致不支。

注：

①据王英 1982 年写的《耀县起义——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建立经过》及杨增杰、阴育民 1983 年 9 月 28 日、10 月 11 日访问谈话记录整理。已经本人作了校订。

②王英又名王振民，时任骑兵团一连一班班长，中共地下党员。现任西安市政协常委。

来源：《耀县起义》

十七路军骑兵第一团耀县起义始末

李啸苍①

1932 年 7 月 21 日，十七路军骑兵第一团团长王泰吉率部在陕西耀县起义。这次起义，对于揭露国民党反动面目，削弱其统治力量，扩大革命影响，起了很大作用。同时对于以后中央红军北上抗日，会师陕北也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王泰吉和骑兵第一团

王泰吉，字仲祥，陕西省临潼县北田镇尖角村人。黄埔军校步兵科毕业。毕业后先后任河南督办公署学生营排长，陕西陆军第三师学兵营营长。为人坚强、勇敢、沉着，能吃苦耐劳，待人诚恳。1928年在国民二军第三师任教导团第一营营长驻防麟游县时率部起义，失败后又参加渭华暴动，旋又失败。以后又去南京，由于坏人告发，被捕入狱。由在南京陕籍黄埔同学具保获释^②。出狱后，去山东见杨虎城，杨即委为补充第二旅(旅长周辅臣)参谋长。1930年杨部入关，后调任王为新兵训练处处长。1931年秋，新兵训练处改编为“讨逆军第十七路军骑兵第一团”，调任王泰吉为团长(同时任薛志超为中校团副，同子春为少校团副，李啸苍为少校教官)。骑兵第一团下属四个连：第一连连长杨鼐，第二连连长谈国帆，第三连连长张龙韬，第四连连长程仰山。骑兵第一团成立时，入、枪均约八百，马四百余匹。一九三二年，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把骑兵团大部分马匹运往南京送给蒋介石以后，只剩下羸马数十匹，再未补充。1932年底骑兵第一团移防三原，次年四月又移驻耀县，旋又奉命开往淳化，不久又调回耀县直到起义。

二、起义前的情况

骑兵第一团成立时，。宫、佐中如一连连长魏志坚、二连连长谈国帆，以及后任二连连长的刘清和、副官袁宏化等人都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在组织上不发生横的关系。魏志坚继杨鼐为第一连连长后，部队被抽调去商县一带阻击红四方面军，开至山阳县东关时，即举行起义，在向西转移途中，为部下蒲章成暗杀。袁宏化在去洛阳军官训练

班受训时，由于党组织被破坏，离开部队。谈国帆也因事离职。以后连长中再也没有革命分子，调来的连长大都是反动、顽固、阴险残忍之徒，其中以郑子明、张龙韬为最。

骑兵第一团二次驻防耀县时，一天，王泰吉和我谈话，征询我对起义的意见。我提出郑子明不可靠。王泰吉说“在三原时，明哥(郑子明也是黄埔一期毕业，二人关系密切，因年令较王大几岁，故称为明哥)首先劝我插旗造反，他不会靠不住”。1933年6月，中共陕西省委派余海丰、何寓础来耀县和王泰吉研究起义问题。余、何走后，王泰吉来到我的住处，把随从人员打发出去之后，同我再次谈起义的问题。他问我：“咱们要起义，你看咱们的士兵靠住靠不住？”我说：“士兵根本没有问题，只是在连长中必须把一连连长郑子明、三连连长张龙韬调离，另派忠实可靠的入接替。各连的排长、班长一定要调离几个，每个连至少要有两个能跟上干的排长、班长。二连连长任建民看起来还能吃苦(当时对任的估计不正确)，总能跟你干一个时候，他没有野心，不必顾虑。四连连长董崇道，容易防范，必要时可以处置他。”当时，我总觉得揭竿起义是翻天覆地的大事情，没有可以信赖的坚强骨干，没有严密的组织性，没有充分的准备是不行的，骑兵第一团的四个连长，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部队平时也没有进行必要的教育，一旦起义，能否掌握住部队是一个大问题，因此，我毫无保留地谈了我的看法。王泰吉听了以后，仍重复前些日子的看法，说：“在三原时，明哥首先劝我插旗造反，他不会靠不住；张龙韬是我的学生，他也不会靠不住。”我说：“自骑兵团成立以来，我从来未向你说过他们一句闲话，今天你要举大事，我就非说不可。你从历史上看，越是认为亲近的，在紧要关头越应注意，卖主求荣的往往是被认为可靠的人。你对郑子朗、张龙韬的为人，恐怕还没有认识清楚”。接着我就把郑子明在二连连长刘清和在军法处管押期间，郑子明当众调戏、猥亵刘清和妻子的卑鄙行径和在西安处决一个犯人时，对已经失掉反抗能力的人，暴逞淫威，施行灭绝人性的一些狠毒做法以及张龙韬亲自谋杀一个见习军官、一个班长、二个士兵的残忍手段和吃空名、侵吞兵饷、克扣士兵伙食、诱兵聚赌的可耻行为向王泰吉详细地说了一

遍。最后我强调说：“你不要为他们的假象所蒙蔽，历史上有许多好的教训，值得我们注意。现在我们要举行起义，就必须把他们两人先行撤换，不然要误大事”。王泰吉听了我的话以后，低头不语，搔首犹豫。他想不到我会把他的两个亲信说成是不可靠的人，思想上显然有所触动，但一时难于决定。以后他和我再未谈及这个问题。我觉得我的建议他绝不会采纳，忠言逆耳，将来对我一定不利，况且我只是一个光杆团副，没有本钱和他们抗衡，于是就离开了部队。骑兵团起义的前几天，王泰吉曾着张绍良来电催促我回部队，由于动了故人之情，同时和老同学邹桂五密商(邹当时是西安绥署步兵训练班教育长)，决计前往，行前一日，起义已经发动，通电已到西安，心又犹豫起来。不多几天，陆续得到起义失利的消息，遂中止此行。我在耀县起义前曾参与其事，起义时没有参加，其原因在此。

三、起义和失败

王泰吉曾于 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被捕后一直到起义前，没有恢复组织关系。骑兵团驻西安时，他和进步人士广泛联系，其中来往最为密切的是何寓础。1932 年冬，骑兵团移驻三原时，适何寓础任省立三原中学教务主任，二人过往密切，同时经何介绍，王与三原教育局局长周芝轩相识。何与周均是共产党员，负责党的地下工作。何介绍王与周相识系受周的指示，而王乐与周结识亦不外乎寻求同志作起义的准备。1933 年 5 月，王泰吉去西安要求杨虎城将军补充枪支，领到一批短枪和子弹。据说，这些枪支杨虎城从不轻易发给部队，这次却发给了王泰吉，这是有用意的。王泰吉这次来西安，从各方面的接触中，增强了他起义的决心和信心。十七路军入陕以来，处处受到蒋介石的歧视和排斥，杨虎城将军对此深为不满。杨对王泰吉是很了解的，所以王来西安三次受到杨的接见，特别在后两次的接见中，杨谈到：“中国军人都斗不过蒋介石，所有杂牌军队将来非叫

人家吃光不可。我看能斗过蒋介石的只有共产党”。杨还说：“说我不行吧，我却能从一个粗人干到已有今天这个摊摊；说我能行吧，我却被蒋介石欺负到这个样子”、“我现在已是五十岁左右的人了，打游击也跑不动了”。杨还表示：“你是一个有作为的青年，在这种环境里未免可惜”。因此，王认为杨在暗示他另辟途径，这对促进王的起义起了很大的作用。六月上旬，王泰吉返耀县前，委托何寓础代表他向省委报告他的起义计划，并请省委派人来领导起义。王泰吉路过三原时，也将起义的事告诉了周芝轩同志。王去后，何寓础请李树言将王泰吉计划起义之事转报了省委。几天之后，省委派发行部部长余海丰与何见面，何即向余详细汇报了王起义的决心和准备情况。余再报省委，省委表示欢迎，并决定由何陪同余去耀县与王面商起义问题。余、何路过三原时，在周芝轩家与周一道研究了骑兵团内部情况。次日到耀县，住在团部。

骑兵团经常人来客往，对商讨起义问题很不方便。一天，王泰吉约何、余假作散步，来到北门外一家菜地水井旁，三入环坐，对起义计划作了详细研究，商定事项如下：

- 1、骑兵团起义后，部队番号改为“西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起义时又临时在西北二字下加上民众二字)。为什么称第三路，不难使敌人认为三路之上还有一路、二路，既能迷惑敌人，又能鼓舞群众，这是根据王泰吉的意见定的。

- 2、起义后，骑兵团四个连均编为大队，队长由信得过的人担任。

- 3、起义后部队只在耀县活动三天。这三天的具体工作是：收缴地方武装；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起义；出布告、发宣言、通电(稿件由省委拟妥送来，起义时拍发)，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口号，向各方面进行革命宣传。同时，释放县政府被押犯人、打击有民愤的土豪劣绅、严明军纪、不扰害百姓。

- 4、起义部队在耀县活动三天之后，即向白水、澄城一带进行游击，并收缴沿途保安团队的枪支武装。必要时可进入黄龙山区。部队

到达白水、澄城一带后，逐步改变官兵成分，改造部队。军官中不愿参加革命者，可予资遣，由士兵中选出新的军官，或提拔一些表现好的排长担任大队长。此外再由省委派来一批党员和革命群众充实各大队领导力量，吸收农民参加革命。

5、省委派人来领导起义，部队的政治工作由省委派来的入成立政治部担任。

6、起义具体时间暂不确定，等省委派来领导起义的同志到后再根据情况决定。特别要注意保密，防止军事上过早过迟的行动，不作仓促无备的举事。

7、起义前，对当地土豪劣绅进行调查，起义时即予扣押，以打击其气焰，并没收其浮财，以济贫困兼资军用。对市面军用物资如西药、布匹等先行调查登记，起义后一律按市价收买，做到公平交易，不损害地方。

除了上述七点外，对于骑兵团四个连长的安排，主要根据王泰吉本人的主观意见，未予变动。何、余去后，王即派人从事官防、符号、旗帜等用物的印刷。这时王泰吉的侄儿王英是骑兵团一连的见习官、共产党员，但王泰吉并不知道他的政治身份。在起义准备阶段，王英发现团部赶制旗帜，始和泰吉取得联系，并为起义做了许多工作。

何、余回西安向省委汇报后，省委即派杨声同志去耀县领导起义。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王泰吉高举“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旗号，宣布在耀县起义，王泰吉任总司令兼第三路总指挥。第三路之下将原骑兵团四个连编为大队，郑子明为第一大队长(郑逃跑后由排长赵国卿继任)，任建民为第二大队长，张龙韬为第三大队长，周得民(周原为排长，连长董崇道在起义前逃跑后派周任大队长)为第四大队长，雷天一(雷原系耀县民团团长，起义时被缴械，随后改编为第五大队)为第五大队长。五个大队之外，又编了一个特务大队(兼管执法)，派谈国帆为大队长，一个机关枪连(实际上只有花筒手提枪几十支，重机枪两挺)，一个迫机炮连(有八二迫击炮二门，是起义时在耀

县缴获的)。政治处由杨声负责，付官长为刘国忠。总计起义时人枪总数约在一千左右，马四十多匹。时张邦英、张仲良在耀县打游击，王泰吉给张领导的游击队补充了枪支，从此耀县游击队有了基础。

三原武字区原属红区，但在马额镇的坡子村驻有三原民团一个分团，团长王茂臣，经常和渭北游击队作对。为了拔掉这个钉子，决定先摧毁这个据点。雷天一自告奋勇，请命出击。那知雷是“金蝉脱壳”，之计，他把部队带出后，根本不去打坡子村，反而和王茂臣合作，趁部队南下后，即返据县城，断绝起义部队退路。起义后为什么不按原计划向白水、澄城一带游击，而要先打三原?主要原因是：

(一)起义后逢耀县石川河水涨，迟滞部队行动，又待雷天一部队，而雷一去不返，在耀县迟滞七天之久，延误了去白水、澄城的行期。

(二)起义前，王泰吉约其友宋剑伯来耀县参加起义，宋与当时驻三原的陕西警备师二团二营营长武靖尘友好，宋曾建议王泰吉派人与武联系，促武响应起义。王派许广仁去三原，约武在起义部队抵达三原时带领他的第二营起义。王认为武响应起义没有问题，故未待许回来，即挥兵攻打三原。

(三)为了扩大起义影响，加强起义力量，准备在三原武字区和渭北游击队(这时已改为红四团)及当地群众开一次联欢大会，造成声势，吸收农民参加革命，壮大起义部队力量。

(四)、如(二)(三)两点成功，部队即往淳化，依嵯峨山区进行游击。

改变原计划是王泰吉与杨声根据起义后出现的新形势共同决定的，在当时情况下是比较可行的。

当起义部队正去攻打三原之际，西安方面的敌人已经组织了一个“铜宜旬耀剿匪总指挥部”，调凤翔绥靖司令刘文伯为指挥官，指挥十七路军特务第一团(团长孙友仁)、陕西警备师第二团(团长杨竹荪)二团兵力，另外还有富平、三原和起义后又叛变的耀县民团已对起义部队形成了大包围。起义部队到达三原心字区辘辘把时与北上敌军遭

遇。王泰吉起初以为与杨竹荪团接触，认为是好机会。因为武靖尘是杨团二营营长，两军接触武必从中策应。但打了三个小时之后，始发觉不是杨团而是孙友仁的特务团，孙团攻势愈来愈猛。王泰吉即令谈国帆特务大队掩护，其它各大队分路经小丘向照金方向撤退。就在分散撤退时，张龙韬带第三大队、任建民带第二大队投降了敌人，第一大队队长郑子明独自逃回高陵。其它各大队在作战时逃散的也不少。只有谈国帆的特务大队保持较完整。部队撤到照金后沟寨子查点时，只剩下一百来人。

四、起义失败的原因

耀县起义失败了。在反动势力尚未削弱的情况下，欲以一个团(人枪仅于的力量)使起义成功，不受损失，当然是不容易的事。但如计划周密，准备充足，起义后虽然受些损失，但绝不会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这次起义失败，原因有以下几点：

1、按照省委同意的起义计划，起义后部队只能在耀县活动三天时间，随后即应向白水、澄城一带游击，这在当时是可行的。由于石川河水涨、等雷天一部队，在耀县滞留七天之久，这时敌人已对耀县形成包围。王泰吉变更计划打淳化，在嵯峨山区建立根据地，在当时情况下也是比较妥当的。问题在于在耀县滞留时间过长，给敌人以从容部署反扑的时间。且起义部队未经充分动员，只是在出发打三原前讲了一次话，官兵意志不统一，滞留时间愈长，部队思想愈混乱，对部队愈不利，与敌军刚一接触，即行瓦解。

2、人事安排失当。从起义到转入照金，大队长中坚持斗争的只谈国帆、赵国卿二人以及少数共产党员和革命士兵。其他如郑子明、任建民、张龙韬等不是逃跑，就是投降。雷天一叛变自不待说。王泰吉用人只重私人感情，不注意阶级出身，只知“待人以诚”“用人不疑”，却不能从郑、任、张的具体事实中吸取教训，提高革命警惕。

后来他坚持单独去见马云从，亦是从“义气”出发，以至身陷囹圄，为敌杀害。如果在起义前，在连、排、班中安排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则在辘辘把与敌接触后向小丘、照金撤退时，几个大队的实力，不会损失那样大，失败不至如此之快，或能出现另一局面。这是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3、起义前的组织领导工作不够有力。骑兵团中有一些共产党员，起义前后都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省委也未派人来加强各级领导工作。“在大队长人选上要由政治上可靠的人担任”的决定没有实现。起义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没有可以信赖的骨干，没有官兵一致的决心与信心。

王泰吉本人确实坚强干练、革命的决心很大。他三次起义，两次被捕，抗志不屈，坚贞不移，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人格可谓高尚、伟大，值得我们学习。

注：

①李啸苍现任西安市政协委员。

②据王英回忆，王泰吉被国民党逮捕管押南京时，为杨虎城所保释。

来源：《耀县起义》

耀县起义的经过情况①

龚逢春②

1933 年，杨虎城的骑兵团团长王泰吉，于五月间③，在耀县起

义。王泰吉是大革命时的党员，后脱党，但还与我党有联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占领了东北，侵至热河，全国各族人民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高潮，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反帝同盟军，还有些人民团体都一致主张抗日。在这种情况下，王泰吉看到有利形势的到来，于是向陕西省委要求派干部来他的部队。这时，我刚从陕南到省委，省委即派我到王的部队帮助工作，后又派杨声来王的部队负责主要工作。我到王部约有月余，王问我是否懂军事，我答不懂，回想起当时可能叫我担任一部分军事工作，后来叫我暂住书记处。

在端午节过后不几天，这支部队就起义了，打的旗帜是西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为总司令，并兼第三路的司令，实际也没有第一、二路，当时留着为其他部队起义。骑兵团有四大连，还有个通讯班，起义后将耀县的地方民团也编入，总共约有千入。甚至连最反动的雷天一也编在编制以内，但后来没有调得动。在起义那天，发了通电，誓师抗日，并在耀县打土豪、分粮食、分衣服，解决了军队中的给养和经济开支等问题。

在耀县城内住了两、三天④后，杨声等计划打三原，因三原心字区、武字区原是个苏区，群众基础好；并有部分游击队在那里。但是部队刚到心字区就发现了敌人，接着打了一仗，这一仗打得很不好。当敌人的炮一响，许多地方民团都吓跑了，打了两、三个钟头后，原来的部队也在跑，便撤到照金。因照金有游击队，是个临时后方。

到照金后，部队仅剩三百多人，战斗部队不到二百人。这时杨声被调走，省委派来高岗。高和王议后，整顿了一下部队，减少了许多非战斗人员。从此开始了游击战争，并吸收了附近的农民参加游击队，壮大了部队力量。到各地打民团，打土豪，分土地、分粮食，这样部队更扩大了。

这时，红二十六军在杜衡的错误领导下，部队被敌人搞垮了。到了秋季，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还有十多个战士，回到了照金，恢复了红二十六军。编了红三团(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和少年先锋队编

的)，团长王世泰。渭北游击队编为红四团，团长黄子祥。成立了一个师，师长王泰吉，参谋长刘志丹，政委高岗。

对于这次起义，我有这样的看法：

1、这次起义是陕西省委组织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起义也是适时的，也是按党的号召来搞的。起义后。打土豪、分粮食等，发动了群众，这样作也是对的。

2、部队中党的基础太弱，仅有些零散的党员和部分脱党的军官，党不能居于绝对领导的地位。

3、对耀县地方民团应该采取消灭缴械的办法，吸收当地的农民群众参加。地方民团在群众中印象很坏，吸收进来影响不好。

4、部队刚起义，一切还没有整顿，就去攻打三原。当时，王泰吉认为他在杨虎城军中威信很高，经过这一下，影响更大，可以号召其他军队起义。他没有估计到统治阶级上层人士的变化情况，攻打三原时在战略上也有缺点，以正规战来和敌人拼消耗。

注：

①摘自龚逢春 1959 年 7 月 24 日访问谈话记录。标题系编者所加，并对个别误记作了订正。

②龚逢春，陕西省城固县人，建国后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已逝世。

③系指农历闰五月。

④据刘映胜、高秀峰等回忆，义勇军在耀县城住了七天。

来源：《耀县起义》

忆王泰吉在耀县起义①

高秀峰②

1933 年夏，王泰吉任第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奉命去淳化、耀县一带进行“剿共”，当时我在西安绥署无线电第二所充当见习员，配属骑兵团一道行军。经过几天的跋涉，并没有发现红军，就驻军到耀县城里。在城里驻扎将近一月，军民相安无事。

大约在同年六月③的一个拂晓，人们大多还未起床，突然听到街上枪声震耳，我赶快爬起床到街头一看，只见有一小队士兵均袒着左臂的袖子，臂膀上系着红色布条，在前面的打着一面红旗，旗上写着“抗日义勇军第三路总指挥”的大字。后面跟随的是一些护旗的武装士兵。这时，我才惊讶地判断出这是发生什么事变了，回去和同事们互相谈论，都莫明其妙，观望着，等待着。

过了一会儿，王泰吉派来两名副官到我们所里说：王团长请各位前去有事相谈。当时我们所长张守静就率领全体官佐前去会见王泰吉。只见王泰吉戴付茶色墨镜，身穿一套普通军服，他又不拘形式，蹲在一条长凳子上，一面招呼我们坐下，一面就开始说：“现在我们中国的局势再不能打内战了，唯有枪口对外一致抗日，中国不抗日就没有出路。咱们这个骑兵团现在已经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第三路。想各位都是些青年人，在这方面，一定会同意一道走这条路的。”我们都表示没有意见，愿意跟着一道干下去。王泰吉又吩咐说，不许随便拍发电报，就叫我们回到所里去了。

当我们回所以后，王泰吉又派来两名副官，轮换监视着我们的机器，不准随便发报。接着一位副官拿来王泰吉签过字的通电文稿，叫向全国各地发出，当即由所长张守静值机，将那篇起义通电向外发出（电文忘记了）。那几天，耀县四城门虽然日夜紧紧关闭，可是城内秩序还维持得很好。

起义过了六、七天，王泰吉率领所有人马向三原方向行军，和十七路军特务一团，还有其它团的兵力发生了遭遇战。我们跟随王泰吉

向淳耀边境的山区逃跑。到了薛家寨，王泰吉召集所有残部约一百余人讲话，号召大家坚决跟着他干下去。

注：

①摘自高秀峰 1963 年 8 月 8 日谈话记录。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高秀峰建国后在西安市蔬菜公司工作，1965 年逝世。

③据习仲勋、张邦英等同志同忆，应为七月。

来源：《耀县起义》